

第五章

蒋介石“变卦”之谜

罗斯福与蒋介石的谅解 斯大林与罗斯福对话

在我首次会见卢汉时，他提到在1943年开罗会议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总统曾对蒋介石表示，战后决不允许把印度支那交还给法国，而应置于国际托管制度之下。卢汉严肃地质问我说：“为什么现在变卦了呢？”我当时无法答复。毫无疑问，这确实是罗斯福的一贯主张。当蒋介石从开罗返回重庆时，罗斯福与蒋介石这段对话成为他们之间的口头谅解，我从蒋介石周围的人嘴里早已听得耳熟了。但为什么后来变卦了，这在当时是个无法解答之谜。现在通过调查研究、联系对比以后，我才恍然大悟，真所谓“事后有先见之明”！

首先翻阅了一下美国国务院编印的美国对外关系文集《1943年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专集》，其中记载着1943年11月23日，在罗斯福别墅，罗斯福与蒋介石叙餐时的谈话。参加叙餐的人，美国方面有罗斯福、霍普金斯；中国方面有蒋介石、宋美龄、王宠惠。编者还在按语中指出，因美国方面没有罗斯福与蒋介石谈话的正式记录，所以现在编印的是中国驻

美大使董显光所提供的谈话纪要(原文中文，译成英文)。其中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谈话如下：

“(7)关于朝鲜、印度支那和泰国——罗斯福总统提出这样的意见，中国和美国应就朝鲜、印度支那和其他殖民地以及泰国的未来地位达成一项相互谅解。蒋委员长在表示同意的同时，强调了给朝鲜独立的必要性。他还认为，中国和美国应共同努力帮助印度支那战后取得独立，而泰国则应恢复独立地位。总统表示同意。”①

很明显，这段摘记是董显光补记时，把印度支那问题偷梁换柱、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了，为蒋介石留下回旋余地。但1943年11月28日下午3时，罗斯福与斯大林在德黑兰苏联大使馆的谈话却有美国方面查尔斯·波伦的详细记录：

“斯大林元帅不厌其详地批评了法国统治阶级，他说按照他的意见，由于过去他们与德国勾结的记录，他们无权享受和平的好处。

“总统说，丘吉尔认为法国将很快恢复强国的地位，但他个人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在法国复兴以后，还需要过多少年才能恢复强国地位。他说法国人，不仅法国政府，而且法国人民，首先必须成为诚实的公民。

“斯大林元帅表示同意并申述他不愿向盟国建议在印度支那恢复旧法国的殖民主义统治……他一再提到法国不得收印度支那并且法国必须对勾结德国的罪行付出代价。

“总统说，他百分之百地同意斯大林元帅的意见，并且强调法国统治印度支那已达一百年之久，那里居民的处境比开始受统治以前更坏了。他说蒋介石对他说，中国对印度支那没有任何意图，但印度支那人民还没有独立的准备。对此他回答说，一俟对日战争结束，菲律宾将无条件地享受独立。他

进一步与蒋介石讨论把印度支那置于托管制度之下的可能性，其任务在使那里的人民在二、三十年内取得独立。

斯大林对此项意见表示完全同意。”^②

为什么在《开罗会议文件集》中没有美国的正式记录，而在《德黑兰会议文件集》中反而有罗斯福和蒋介石谈话的内容呢？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从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所著《历史的见证》（1929—1969）[《Witness To History》（1929—1969）]一书中找到了答案。

查尔斯·波伦是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当时任美国国务院欧洲司俄国处处长。他在《历史的见证》一书中写道：“……在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商谈亚洲战争时，我漫游了开罗市。”

他还在同书中写道：“我发现美国政府没有准备人员在会议上作记录，感到很吃惊。最后，由美国军营中派来四名熟谙速写技术的士兵，他们不能参加会议，由我根据笔记口授，他们写成会议记录（指德黑兰会议）。”

查尔斯·波伦在谈到罗斯福的工作方法时写道：“对于将要讨论的问题，罗斯福并没有介绍情况的文件，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罗斯福的这种不拘形式的工作方法。他不愿意受任何条条框框或者规章制度的束缚，他宁可根据临时想到的念头而不愿按计划办事。”^③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当时苏联尚受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的约束，为了麻痹日本，斯大林避免与蒋介石坐在一起开国际会议。因此一个主题，两个会议。从而使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同蒋介石讲过的话，在德黑兰会议上他不得不向斯大林再重复一遍。所以董显光所提供的那个《谈话纪要》中的偷梁换

柱的拙劣手法未能奏效。

尽管这样，罗斯福反对战后把印度支那交还给法国这一点确是他的一贯主张（有十几种回忆录提到这一主张），但已如上述，他和蒋介石对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谈话始终没有正式记录，更谈不上具有约束性的外交文件了。因此，随着美、蒋矛盾的发展，罗、蒋在开罗会议上就印度支那问题所取得的口头谅解是随时可以变卦的。

美蒋矛盾 法国受宠

要了解变化之谜，还得从美、蒋矛盾谈起。当时美、蒋矛盾的发展，集中反映在罗斯福强迫蒋介石授权史迪威^④指挥中国全部军队对付日本的问题上。1941年12月8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爆发太平洋战争。蒋介石闻讯大喜，决定向美国建议缔结中、美、英、荷、澳五国军事同盟，当即获得罗斯福同意。1942年元旦，罗斯福与丘吉尔发表联合国宣言后，罗即电蒋，建议组织中国战区，并推蒋为中国战区的统帅，指挥中、越、泰、缅军事。在统帅部内设联合参谋处，由中、美、英三国派员担任参谋。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统帅后，为进一步勾结美国，特电罗斯福，请指派美国高级将领一人来华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于是，美国于3月初指派史迪威（Stilwell）来华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来华后，以美国总统的代表自居，态度傲慢，为蒋不悦。

史迪威来到重庆不久，蒋介石即派他到缅甸指挥中国作战，以打通滇缅公路，保证大后方的交通运输。据说，史去后独断专行，英军不听号令先撤，蒋军大败；他见归路被截断，竟

丢下军队，徒步逃往印度，既不与蒋联络，也不报告军情，反而在六月返回重庆，指责蒋的部下无能，不听指挥，造成缅甸失败。他要蒋撤去杜聿明军长职务，让孙立人、廖耀湘接替。蒋甚为不满，拒绝史的要求。蒋、史矛盾遂趋尖锐。

蒋介石要求美国派高级军官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目的，是为了多得租借物资，装备他的部队，这样既可以防止日寇进攻，更可以在战后消灭共产党。而史迪威则以租借物资卡压蒋介石，将大部租借物资给了入缅作战部队，补充蒋军国内部队的为数极少。蒋更为愤恨。1943年12月，日军攻占湘西门户——常德重镇，威胁到美国空军基地，罗斯福召史迪威去开罗询问蒋军抗日能力如何，史迪威在罗斯福面前大讲国民党之腐败，蒋介石之无能。罗斯福听后说，国民党既然如此，可与其他党派联系，改变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局面。史迪威得此指示后，于1944年初秋，要求与何应钦、商震会谈。在会谈时，史迪威从缅甸作战兵力不足，说到东战场之挫败，都是由于蒋军保存实力，不肯积极作战的结果。并认为这是想把击败日本的全部担子，放在美国肩上，等待美国击败日本后，用保存下来的实力打内战。密令胡宗南统领四十万大军围困中共于陕北，而不参加对日作战，就是铁证。要求蒋军改变这种谋略。接着还说，共产党统率的第十八集团军能吃苦耐劳，骁勇善战，能领导人民进行游击战，只是缺乏武器。他建议为了使同盟国在中国战区早日击败共同的敌人，应即撤出封锁陕北的部队，邀请第十八集团军出来抗日。美国愿与共产党合作，愿将租借军用物资直接装备共产党的军队。何应钦等将会谈情况报告蒋介石后，蒋乘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时，将史迪威的言行告华莱士转达罗斯福，要求调回史迪威。谁知华莱士返美后，不仅未将史迪威调回，罗斯福反而一再

电谓，日军进攻平汉路，形势危急，拟晋升史迪威为陆军上将，请蒋介石同意，在蒋直辖之下统率在中国战区之全部部队。史迪威急不可待，多次催蒋交权，蒋对史迪威更是深恶痛绝。其实史迪威要装备第十八集团军是假，实质是借此压蒋，胁迫蒋介石把中国战区全部指挥实权交给美国人。蒋介石岂能同意！于是，美、蒋矛盾更加尖锐了。^①

正是在美、蒋矛盾空前尖锐的时候，蒋介石突然于1944年10月10日秘密接见刚由国民党政府承认的、由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政府代表贝志高将军，^②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决不是偶然的。

贝志高在与蒋介石会见后，翌日即将详细情况密电法国政府。电文中写道：“会谈历一小时以上，非常融洽。委员长毫不拘束地说明了他所十分关心的有关法中关系的各个方面。”首先他“特别强调加强法中政治联系的重要意义……希望从此把我们的传统地位肯定下来。”其次他说，“经济联系也不应该忽略。特别是法国人的思想比盎格鲁撒克逊人（不管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更接近中国人。委员长希望法国继续培养中国所需要的专家。”“后来他主动地谈到印度支那问题。这段话非常重要，谨将他的原话引述如下：‘我要再一次向您肯定’，‘不论对于印度支那或者印度支那的领土，我们都没有任何企图。在这个问题上，我的主张是坚定不移的。如果我们能够帮助贵国在该殖民地建立法国政权，我们是乐意的。请您亲自把我这个意愿正式转达给戴高乐将军’。”并说，“贵国驻印度支那的军队如果受到日本的压力而不得不退到中国时，将会受到兄弟般的接待。”最后他表示“非常赞赏戴高乐将军的智慧和能力，并请我把他亲手签名的照片转赠给戴高乐将军。”

必须指出，蒋介石是在美蒋矛盾发展到空前尖锐的时刻，才召见法国大使贝志高将军的。最令人惊奇的是，蒋介石与贝志高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一席谈话适与 1943 年开罗会议时罗斯福与蒋介石的会谈形成鲜明的对照。1943 年开罗会议时，罗斯福对蒋介石说，战后决不允许把印度支那还给法国；而 1944 年蒋介石对贝志高说，“如果我们能够帮助贵国在该殖民地建立法国政权，我们是乐意的。”

蒋介石接见贝志高的翌日，美国大使赫尔利急电罗斯福要求迅速将史迪威撤回，史迪威于 10 月 19 日收到调回的正式命令，终于 20 日返美。^⑦ 美蒋矛盾这场风波才告一段落。当时我在兰州适有事前往重庆一行，偶遇民社党领袖张君励。他同我聊天时说：“蒋先生真了不起！罗斯福干涉中国内政，蔑视中国主权，他居然敢于抗美，甚至叫嚷不惜与美绝交！”他这番话曾使我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认为他敢抗美，还不失为有民族骨气的人物。现在真相大白，原来如此！

由此可见，蒋介石违反罗斯福在开罗所达成的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口头谅解，不是在抗日胜利以后，而是在 1944 年 10 月抗日战争尚未结束之时，不是在罗斯福逝世以后，而是在 1945 年 4 月 12 日罗斯福在佐治亚温泉逝世之前。

美国易辙 法国得势

罗斯福逝世后，继任总统杜鲁门再也不提罗斯福生前所坚持的决不允许把印度支那还给法国的一贯主张了。恰恰相反，1945 年 5 月 8 日，在柏林参加德国军队投降仪式的盟国代表名单中就有法国代表塔西尼将军。^⑧ 也不再听到 1943

年德黑兰会议时，斯大林强烈批评法国统治阶级，“由于他们过去与德国勾结的记录，他们无权享受和平的好处”等等论调了。原来国际形势起了变化，由于 1944 年 12 月 10 日法苏互助条约的签订，法苏关系已确立了共同对德作战的同盟基础。^⑨在 1945 年日军投降、英军接管越南南方后，法军在英、美的庇护下，已偷偷地溜进了越南。1945 年 9 月 2 日，在东京湾米苏里号军舰上，参加日本投降仪式的盟国代表中就有法国代表勒克莱将军。也就是他，率领法军进入越北，从国民党军队手中接管了越南防务。

从上述情况看来，1944 年 10 月 10 日确是关键性的日子，就在那一天，蒋介石突然秘密接见法国大使贝志高，通过他向戴高乐作出愿在战后帮助法国卷土重来、在印度支那恢复殖民政权的保证。这就是我们在河内一时无法解答的谜底！

^① 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3 年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专集》第 322—325 页。

^② 同上，第 485 页。

^③ 见查尔斯·波伦著：《历史的见证》(Witness to History) 1929—1969 年英文版，第 135—136 页。

^④ 史迪威青年时代毕业于美国“西点军官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中国，在驻北京的美国军队中服务，学习中文。后入“步兵专门学校”及“军事学院”深造。后又来天津任美军第十五团营长（当时马歇尔任团长）和美驻华大使馆武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回国，历任准将、旅长、少将、师长。调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时升为中将，后又升为四星上将。在中国战区解职后，曾任美国第十军军长，1946 年患肝癌逝世。

史迪威先后在华十年，粗通中文，自称美国之中国通。但对中国人情世故、政治军事的演变，颇多误解。在抗日战争期间，尤视中国为极落后的殖民地。藐视国民党高级将领，背地称蒋介石为“花生”(peanut)，称其他将领如何应钦、陈诚等为“一篮子花生”。

^⑤ 见杜建时著：《抗日战争时期蒋美勾结与矛盾》，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集》第 57 集第 188—210 页。

^⑥ 齐诺维·贝志高 (Zinovief Pechkoff 或译贝契柯夫) 生于 1884 年，原

籍俄国，苏联文豪高尔基的养子。1914年加入法国外籍志愿军团，在前线战斗中受伤、切断了右臂；1925年在黑夫（摩洛哥）前线战斗中受重伤，左足跛。从此以后成为独臂、跛足将军。自1917年以后，一再前往中国、日本、西伯利亚、高加索、南非、西非等地，担负法国外交部的临时使命。因此他既是将军、又是外交家。1941年加入“自由法国”，1943—1945年任驻重庆大使，后任驻日大使，1949年退休。1964年1月中法建交前，戴高乐曾派他为特使，偕同法国武官吉业马前往台湾安抚过蒋介石（详见1965—1966年法国人物志第2154—2155页）。

⑦ 见上述杜建时文，第220页。

⑧ 《国际条约集》1945—1947年第27页。

⑨ 同上，1934—1944年第452—454页。